

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特征及趋势

——基于战略性大宗商品视角

仰 炬 耿洪洲 戴天柱

摘 要: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引发的贸易战争更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而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制成品。文章从战略性大宗商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在贸易保护的同时,利用其控制战略性大宗商品定价权推高基础资源价格,从而削弱出口国产业竞争力,来保护国内产业及弥补贸易保护带来的福利损失,并通过对棉花价格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阶段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争端缘由及趋势。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宗商品;全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9-0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减少,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手段,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实施限制关税,从9月26日起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17起反倾销和9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108亿美元。而最近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又相继对我国钢管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表1)。

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个危险的信号。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

收稿日期:2011-03-11。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226)、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J5120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09BJB007)、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09ZS188)、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及上海对外贸易学院085工程项目“大宗商品国际金融衍生工具规则与定价权问题研究: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角度”资助。

作者简介:仰炬,博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兼职副教授。耿洪洲,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处长。戴天柱,博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引发的贸易战争更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而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大宗商品的制成品。本文拟从战略性大宗商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棉花价格的实证研究展开深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阶段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争端缘由及趋势。

一、文献回顾

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重商主义—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重商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

表1 2009年以来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

商品	提出国	时间	要求或裁决结果
钢绞线和钢隔栅板	美国	2009年10月27日	钢绞线：7.53%~12.06% 钢隔栅板：7.44%
输油钢管	美国	2009年11月5日	在10.69%~30.69%的基础上加征36.53%~99.14%的反倾销关税，并征收10.36%~15.78%的反补贴税关税
无缝钢管	美国	2009年10月7日	要求征收98.37%的反倾销税，并对中国政府补贴征收额外的反补贴税
无缝钢管	欧盟	2009年10月6日	17.7%~39.2%的反倾销税
紫铜管	美国	2009年9月30日	于当日立案
轮胎	美国	2009年9月	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第1年至第3年额外征收的关税分别为55%、45%、35%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展。Eaton和Grossman(1985)证明当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化的风险时，政府可以通过进口保护政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实现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Long和Vousden(1991)建立的模型表明当所有关税收入完全分配给流动要素或者受保护的专有要素时，关税将不能完全抵消进口品的价格变动。Helpman (1995)在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的框架下对贸易的政治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了有益的结论：模型决定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和结构具有类似的结构和形式。诺贝尔特·冯克(1995)分析了贸易型投资措施这一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述了在传统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下降的同时，非关税贸易壁垒却越来越重要，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Makoto Okamura和Kiochi Futagami (1998)运用两阶段数学模型证明了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在第一阶段进行贸易保护能够增加两阶段的总福利。Mads Greaker (2006)分析了生态标签制度这种保护手段，认为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对本国和外国厂商采用生态标签制度要比设定环境标准来说更优，但是这种政策起到的保护程度是不确定的。Earl L.Grinols和Peri Silva (2008)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最小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能保证效率和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学者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荆文辉和于建生(1995)分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指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并不是维护公平贸易，而是实行贸易保护。夏先良在同年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对一些幼稚产业进行保护。贾宁、梅义仁(1996)通过对美国《伯德修正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通过此修正案意图挑战

国际贸易规则。张曙光、张燕生和万中心(199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后的福利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总的福利效应为正。刘东勋、瞿志成、陈多才(1998)论证了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保护贸易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谢识予、尹翔硕和陈涛(1999)对非关税壁垒在我国贸易保护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讨论了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我国进口的影响,指出我国的非关税措施作用大大优于关税。强磊、张二震(1999)对战后日本的贸易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指出我国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张可云(2000)分析评价了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保护理论,建议区域分工与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区域合作,区域贸易保护也不会必然导致区域冲突。王小龙、李斌(2002)运用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了地区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区贸易保护问题,指出贸易保护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博弈的必然结果,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地方贸易保护。周曙东、吴方卫(2003)通过对中日菠菜贸易的实证分析指出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实力博弈后的纳什均衡,但如果商品出口量超过临界点,则会引发战略性贸易保护。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角度出发,运用重复博弈的概念和方法,阐述了为何无法实现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范兆斌、左正强(2005)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和动因,指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质疑。王晓雷(2006)分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原因,认为没有理由表明贸易逆差恶化了美国经济和就业,贸易保护也不能治理美国的贸易逆差。刘苗苗(2006)对日本如何应用原产地规则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了研究,指出看似中立甚至善意的规则,也可以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刘志雄、和秀荣(2006)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频频发生的原因,认为贸易中的国家都在按奥尔森的思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当今国际贸易格局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李淑俊、郭增栋(2007)认为美国国会扮演了中美贸易的“警察”角色,推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成心轩(2007)借鉴Jiandong Ju和Krishna的模型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公司行为选择的影响。向前、左海聪、王鸿喜(2007)通过分析日本的特殊保障制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保健云(2008)运用一国内部动态博弈模型与跨国模型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探讨了如何构建与完善国际治理机构。赵美英(2008)从一个双寡头模型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基于贸易保护目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制定一定措施来规避损失,但是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为了转移这些额外成本给国外厂商,政府倾向于制定高于需要水平的保护性标准。徐仙明(2009)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针对中国的原因,指出中国存在出口过度集中、企业应诉不力、非市场经济遭遇歧视等问题。梁碧波于2009年对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基本目标是决定贸易保护程度的主要变量,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渠慎宁、杨丹辉(2009)通过对1970~2008年美国进口倾向变化的统计分析,探讨了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建立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奥巴马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认为这一条款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下降,对经济复苏意义不大。

二、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很多种,对于进口品来说分为关税、配额以及歧视性政府采购,对于出口品来说分为补贴、出口退税等。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评判,一般标准是通过

衡量总剩余的得失来进行比较。

传统的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而且容易引起别国的报复行为,那么为什么近期欧美还对我国进行如此频繁的贸易调查呢?基于大宗商品视野,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欧美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它可以通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获取利益来补偿它实施贸易保护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由图1可知,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商品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由此造成供给曲线 S_x 右移至 S_x' 。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理论上就可以限制外国进口。由图1可以看出,消费者剩余减少 $a+b+c$,生产者剩余增加 $a+b+d$,而由于没有进口,所以没有税收收入,那么此国净福利盈余为 $d-c$,当 d 大于 c 时,此国净福利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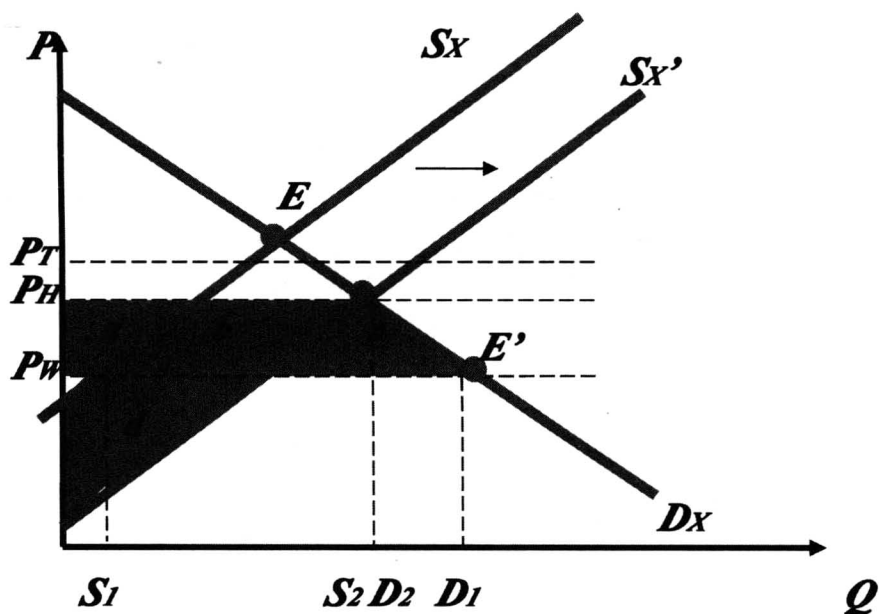


图1 为控制原料价格并且实施惩罚性关税的效应分析

三、2003~2005年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

回顾2003~2005年中美和中欧在纺织品贸易领域摩擦频繁,之后中美、中欧经过艰苦的谈判从此解决了在纺织品领域的贸易争端,即自2005年年中起,对配额外的进口棉花征收滑准税。税率滑动范围为5%~40%。众所周知,中国纺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棉花,但是滑准税政策使中国纺织企业的成本比国际竞争对手高出很多。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平均每吨贵1500元,低等级棉花更是比印度高出4000元左右,如此高的成本使我国棉纺产品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此外我国棉花与进口棉花相比,质量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三丝”、“种乱”等。由于有滑准税的保护,这些问题得不到重视,因此滑准税的实施抑制了我国棉

花质量的提高。

由纽约期货交易所美棉指数图可以看到,2003~2005年,国际棉价基本在历史低位徘徊,我国棉纺织业通过进口质优价廉的棉花,其产品的竞争力是造成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

纵观2005年到现在的国际棉价,可以发现,除2008年8月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动荡中,国际棉花价格有过约4个月的大幅调整后,又很快回到历史高位,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在如此高企的价格下进口棉花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要征滑准税,中国的纺织品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到不足以影响美欧纺织品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这也就不难解释2005年后鲜有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④、近期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制成品。

纵观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与此对应的橡胶、钢材及伦敦铜的价格也类似于美棉价格指数,相比而言,日胶更加坚挺些。

比较有趣的是,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基本都发生在此次相关大宗原材料价格因美国金融危机大幅调整的时期,这不能说只是巧合。

正如前文分析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限制外国进口。

而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控这些大宗原材料价格获得巨额利润,也增加了该国总的福利。因此,传统国际贸易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定论有可以补充和完善之处。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近阶段贸易争端的发展趋势给出基本判断: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回高位,相关的贸易争端将逐步减少。正如失去了质优价廉进口棉花后的纺织业,我国大宗商品相关产业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在世界范围失去竞争优势,由此所谓的贸易争端也将逐步平息。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商务部)

参考文献:

- [1] 荆文辉,于建生.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1995,(6).
- [2] 夏先良.论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的选择[J].财贸经济,1995,(10).
- [3] 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 [4] 张可云.区域分工与区域贸易保护的理论分析[J].理论研究,2000,(5).
- [5] 侯云先,林文,于英川.两国产业保护非合作博弈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2002,(10).
- [6] 詹晶,宁曼荣.外部经济: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新视角[J].财贸研究,2004,(5).

(下转第26页)